



□孙葆元

时下有一些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,将那个年代的生活拍出了唯美的感觉。但宋朝却并不是唯美的。

范仲淹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不是华词美句,而是对一个朝廷有的放矢的告诫。那个朝代正是被当代视为“清平乐”的朝代,旖旎香软,笙歌曼舞,后宫争宠。“忧”是何忧?所有的社会焦虑都被一片芳菲覆盖起来。宋朝美的主流是忧患下的美,是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去无留意”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而不是“小院香径独徘徊”的病态美。后人常说宋风婉约,即使婉约的词也是怀念故国“染柳烟浓,吹梅笛怨”的哀婉,透着收复山河的壮志,应该是宋风的主调。

范仲淹的“忧”,既有边患之忧,也有国家治理之忧。宋朝的繁华始终是在契丹和西夏阴影下的繁华,它的世风之美有时也是一种病态的美。

就以宋仁宗赵祯时期为例。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,他也想励精图治,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局。康定元年(1040),西夏的元昊开始不安分起来,大举犯境,西夏军攻破陕西延安西北的金明寨,直逼延州,宋廷急调援军万人抵御,却被西夏军困于三川口,惨遭重创。这次败绩,无论是军威还是朝廷面子都一败涂地。宋军自然咽不下这口气,伺机找回面子,康定二年(1041)举二十万重兵攻取西夏的渭州。狡猾的元昊见宋军来势汹汹,晃了一枪,诈败而逃。宋军认为出气的机会到了,乘胜追击,追到宁夏的好水川,陷入西夏军的埋伏,大败而归。仗打到这个份儿上,想罢战都罢不了。庆历二年(1042)闰九月,西夏又发重兵攻打宁夏固原,宋军急忙招架,派大将葛怀敏提军应战。西夏军故伎重演,引诱宋军至固原西北的定川砦,突然切断宋军归路,前面退却的西夏军回头猛扑。这一仗,宋军死九千四百余人,葛怀敏和十六员大将战死疆场,西夏军乘势直抵甘肃肃凉,大掠而归。大宋与西夏之战打了三年,这样一副局面有什么“清平”,还有什么“乐”?宋仁宗内心是焦虑的,关陇大战,军费耗费巨大,他更担心的是东北边陲的辽国,倘若夏辽联合,后果更不可设想。没办法,只有“议和”。元昊打赢了战争,却失去了大宋给予的市场经济,物资匮乏,难以为继,也同意“议和”。两个“议和”却“议”出了不同的味道。宋仁宗被迫承认元昊为西夏“国主”的地位,每年供奉银五万两、绢十三万匹、茶两万斤,还不算其他佳节的馈赠。一个大国,“岁贡”实在有辱颜面,那个和约就玩起了文字游戏,叫“岁赐”。岁贡也好,岁赐也好,都是拿出东西送给人家。

“岁赐”是大宋的外交传统。往前推三十八年是宋景德元年(1004),当年辽军犯境,攻破河北清丰,劲旅直逼澶州。面对着进犯,宋真宗竟想迁都南逃,一群大臣附和着,都不想抵抗。只有寇准力排众议,督促真宗亲征。结果却是反转的现实。宋军在皇帝的激励下三军用命,一举陷辽军于死

地。在澶州城上观战的宋真宗亲见辽师大败,心里仍然惴惴然、惶惶然,本是一场胜仗,却与辽师签下《澶渊之盟》,每年向辽国输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。后世的史学家称:这是以“金钱换和平”。以金钱买和平,这个朝廷尊严何在?没有尊严,何美之有?

范仲淹看透了朝廷方方面面的孱弱,从西北战场上回来,怀揣强国之梦,于庆历三年(1043)推行了北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系的改革,一举推出十条措施:明黜陟,是讲要重新审定百官的业绩,严格考核,以实效论绩,提高行政效率;抑侥幸,是限制大官僚的“恩幸”特权,革除滥赏,减少冗官;精贡举,力推改革取士制度,选拔人才应该先德行,次艺业,正教化,育人才;择官长,即严格选拔地方各级官吏,以社稷安危衡量官员的作为,要求官员正纲纪、去疾苦、救生民;均公田,这是一条对官员的赏罚措施,按官员等级给予“职田”,责其廉洁,天下政平;厚农桑,鼓励各地兴修水利,行劝课之法,救水旱,丰稼穡,增国力;修武备,这是农兵合一的举措,在京畿及其附近地区招募民兵五万,辅助正兵,捍卫朝廷,三时务农,一时教战;减徭役,撤并州县,以此减少官员,降低行政成本,减轻农民负担;覃恩信,是强调政令贯通,坚决贯彻朝廷颁布,不许地方折扣以换取民众的信任;重命令,是强调朝廷旨诏的权威,令行禁止,严惩失职官员。

十项举措,掷地有声,是范仲淹治国的精彩。然而,细细思量十条措施的背后,不正是那个社会痼疾之所在吗?正是那个痼疾让社会进入病态。这次改革史称“庆历新政”,上有宋仁宗许可,高层有宰相杜衍支持,范仲淹身为参知政事,相当于副宰相,周围还有欧阳修知谏院,以及富弼、韩琦等人,全是当朝精英,然而“新政”还是失败了。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夏竦一句范仲淹,欧阳修“党人”就轻松地击溃了这次改革,“重命令”之患不幸被范仲淹言中,而且覆辙就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足见权贵阶层势力的强大。如此北宋,何美之有?

北宋王朝不是积贫积弱的软弱,而是治国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,温香软玉,缺乏风骨,梦想强国却惧怕强兵。因为从太祖赵匡胤时代就靠强兵窃国,怕前史重演,防将军谋反甚于防敌寇入侵,一直是文官治军,始终繁荣在北方夏辽铁骑的阴影里。北宋没打过几次像模像样的胜仗,靖康之后倒是以岳飞为首的抗金派表现出军事上的硬度,却让投降派之手拍灭于“莫须有”,让人欲赞无辞。清人王夫之评论此朝:“计此三十年间,人才之黜陟,国政之兴革,一彼一此,不能以终岁。吏无适守,民无适从,天下之若惊若鹜,延颈举趾,不一其情者,不知其何似,而大概可思矣。”他的意思是说,人才升降,国家施治,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,不能坚持一整年,就造成官员无法适职,民众无法适从,天下如同惊鸟,伸脖举足,始终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,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,这是大概可以想到的了。一言以蔽之,就是缺乏稳定性。所以他说,“朝不能靖,民不能莫,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!”留下的只有凄美的晚照。

□崔广勋

“烧包”一词,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查不到,大概是我们沂蒙老区的方言,意思大体是说贫穷却故意摆阔,可能是由“要饭的烤席笼子——穷烧包”的歇后语缩写或衍生而来。它与“哭穷”虽不是标准的反义词,但表达的意思是相反的——“哭穷”主要是讲家里实则富有,口头上故意装穷,该词在词典中倒是可以追根溯源。

大凡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知道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可是农村颇为流行的两种极端的社会现象,也是口头使用频率特高的两个词。

先说“烧包”。“烧包”的指代对象,大都是当时农村二十来岁的男青年。买辆城里人“退居二线”的自行车骑,被称作“烧包”;买块二三十元的“钟山”表戴戴,被称作“烧包”;穿着从商店买的凉鞋下地干活(那时人们大都穿用地排车外胎自制的“鞋垫子”),被称作“烧包”;把崭新的衬衣束到裤子里(怕糟踏坏了),被称作“烧包”;穿皮鞋、打领带、打头油、搓雪花膏……统统被称作“烧包”。

说得也有一定道理。当时家家拆了东墙补西墙,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,“哪有闲钱补灯笼”,故意摆阔?不是“要饭的烤席笼子——穷烧包”,是啥?

当然,不少“烧包”者也是有“不可告人的目的”,那就是炫耀自家的富有,显摆本人的潇洒漂亮,以求“混”上个对象。但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谁?为了避“烧包”之嫌,有的青年便想出了闯关东的点子,别管挣着挣不着钱,到东北混上个三年两年或一年半载,凑二三百元钱寄给家里(挣不着钱也有家里先寄去的),然后家里再私下寄回去,他再大明大摆地寄回来。这些钱通过邮局“旅游”几个来回,投递员经常到家里送汇款单,给村里人就留下了混得很好、挣了大钱的印象,这样便可以身着羊皮大衣、脚穿大头皮鞋回家相亲了。挣钱了,“不扶(垄)不结地瓜”(地瓜需栽植在扶起的垄上才结地瓜。沂蒙方言,不服也得服的意思),人们不再说三道四,找对象的事也十拿九稳有眉目了。

受“烧包”现象及其“流毒”的影响,前些年,在外工作的我每次回老家,总不敢造次,唯恐沾上“烧包”之嫌,以至于进村前要把束在裤子里的衬衣拽出来,把手表、领带摘下来,甚至故意把锃亮的皮鞋沾点尘土,唯恐别人说“穿烂裆裤子”。上世纪90年代,因工作需要,单位给配了个传呼机,进村时更是赶忙从腰间摘下来,也是担心人会问:吃了三天“公家饭”,“烧包”烧得不知道姓什么了。

时代的变革,都是悄

无声息的。如今的农村,不仅年轻人,老年人都把衬衣扎在裤子里,而且大都西装革履;不再腰挂传呼机,都是手拿智能手机了。我猛然发现,如今说谁谁“烧包”的现象悄然消失了。春节期间,我与本家大叔闲唠起这个话题,大叔说的话糙理不糙:“过去穷时摆洋阔,当然是‘烧包’。现在咱脱贫致富,家家过上了小康生活,生活也得讲究品质了,吃好穿好用好顺理成章,习以为常,过去‘烧包’的特殊现象如今成了正常现象,‘烧包’的话也就派不上用场,逐渐被遗忘没人说了。再说谁谁‘烧包’,那不是吃饱了撑的,是啥?”

不仅如此,据说现在“烧包”的定义又有了新外延,在网上“烧包”竟成了一种时尚、潮流的代名词,是对个性消费、超前消费的肯定和引领。以年轻人为主的“烧包族”已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消费大军,拉动了经济循环和增长。

与“烧包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“哭穷”。过去大凡“哭穷”者,都是人口多、孩子小的家庭(孩子大了再哭穷,怕找不着对象),几个人凑在一起拉家常,往往是一个劲儿抱怨孩子如何肚子大,把家给吃穷了。有的家庭偶尔吃顿纯麦煎饼或白面馒头,也是藏着掖着,不准孩子拿到外面吃——怕人家看见“露富”。见了村干部,更是装出可怜兮兮的寒酸样,声情并茂地述说家中如何困难。

故意“哭穷”,的确也是让穷逼的。这样做的唯一目的,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家少吃缺喝,能够领点救济款,吃点统销粮,享受点减免。即使只有十块八块钱、十斤八斤粮,但在十分工一角钱的年代,也能解燃眉之急。

结合农村“烧包”一词的销声匿迹,细一琢磨,“哭穷”的现象如今竟也没有了。谈起“哭穷”现象在农村的“绝迹”,依然是我那肚里有点墨水的本家大叔品咂得到位:“现在救济款、统销粮、减免之类的没有了,即使有也不在乎那点钱了;再者,现在是市场经济,家家同处于一条起跑线上,不缺胳膊不少腿的,再整天吆喝穷,叫人看不起不说,那说明他没本事,活该!”

一些司空见惯乃至熟视无睹的表面现象,往往最能揭示事物本质。我在想,“烧包”和“哭穷”作为一个年代的流行词和社会现象,如今在农村悄然消失,这之间的鲜明反差,不正说明了时代的日新月异、经济的突飞猛进和观念的深刻转变吗?

岁月如歌。无论如何变迁,“烧包”和“哭穷”,在我与一代人的脑际深处,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时代印记和永恒感念,历久弥新,酸楚忧伤而又甘甜如糖……

【岁月留痕】

烧包与哭穷

【文化杂谈】

宋朝不是唯美的宋朝